

《晁氏宝文堂书目》文献价值新论

孙 蕴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晁氏宝文堂书目》是明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私人藏书目录。根据家藏书籍的实际情况下、中、下三卷,共计33目。设置了“四六”“举业”“乐府”等新类目,著录了后世清查书籍的情况、书籍的刊刻信息与内容结构,收录了数量可观的话本、小说、杂剧、传奇等俗文学书籍,尤其注重保存了丰富的版本信息。此外,书目在著录方式上采用了科学的“互著”方法,便于检索查阅。

关键词:《晁氏宝文堂书目》;类目;著录;版本;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1-0022-07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

《宝文堂书目》收录的是晁璪与次子东吴二人的藏书。晁璪(1507—1560),字君石,别号春陵,慕鉴湖高风,更号镜湖。明代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嘉靖辛丑(1541年)登进士第,选翰林庶吉士。居翰林二十年,称词垣宗匠,著有《镜湖文集》《晁氏足征录》等。东吴字叔权,晁璪次子,少年英才。《国朝献征录》有传,称其“弱冠登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读中秘书。当甲寅,上书称疾归,遂以其年冬困笃,得年二十三耳”^{[1]62}。晁璪辑录东吴遗文四卷、墨迹一卷,名《诚痛录》。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晁璪君石,子东吴叔权。

昭德先生书满家,自言梨味不如楂。
礼堂翻定童乌本,痛极优昙顷刻花。

东吴:璪次子,弱冠第进士,年二十三卒。其父璪手录其遗文,总四卷,墨迹一卷,名曰《诚痛录》。^{[2]173}

明开州于宋代称澶州,辖区为今河南濮阳一带。晁氏为当地著名文化大族,藏书活动或自一世祖晁迥始,出过晁公武这样的目录学大家。晁璪父子皆喜藏书、刻书,曾校刻晁氏族姓先人文集为四卷本《晁氏三先生集》,收录晁迥、晁冲之、晁说之三人作品,卷末有“嘉靖甲寅裔孙璪、东吴重刊”字样。据《明故奉训大夫司经局洗马镜湖晁

公(璪)暨配二张孺人合葬墓志铭》:

五代时讳佺者摄从事职于彭门,生三子:迪、迥、遘。迪居巨野,遘居嵩、浍,迥居澶州。……迥生宗憲……宗憲三世而为徽猷阁待制说之。^{[3]73}

乾隆四十年(1775年)刻本《晁氏家乘》卷八《开州族略》:

说之生公寿、公菴,公寿生子健,俱历显仕,子健六世而至良兴,生伯元,伯元生信,信生旺,旺号留耕老人,生德水、德江、德龙,德龙字利见,别号南庄……德龙生璪。^[4]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九日《明封翰林院检讨徵仕郎晁君(德龙)墓志铭》:

晁氏,故澶州人。五代时有讳佺者生子迥,官至大傅,谥文元。迥生宗憲,参知政事,谥文庄。庄三传至徽猷阁待制说之,又五世,至良兴,则君之高祖也。曾祖讳伯,元祖讳信,考讳旺。母靳氏,生君,君讳德龙,字时见。^{[3]178}

可知晁迥、晁说之、晁冲之、晁璪皆为宋澶州(今河南濮阳)晁氏。据刘焕阳先生考证,晁冲之为说之族弟,公武之父^{[5]50}。

《四库全书》收录的晁迥《法藏碎金录》一书为嘉靖间晁璪从内阁录出、钹版刊行者。该书的嘉靖晁氏刻本版心上方有“宝文堂”三字,更名为

收稿日期:2020-10-13

作者简介:孙蕴(1985—),女,山东烟台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

《迦谈》，四库馆臣从原书名著录。李开先曾撰《寄题晁春陵藏书屋》诗，以赞晁氏藏书之盛、问学之勤：

世史子长名姓芳，雄文巨笔述明昌。

牙签悉付僮奴掌，绡帙频劳使者将。蝌蚪周书掘冢得，龙蛇禹刻出山藏。读书莫凿匡衡壁，自有窗前明月光。^{[6]78}

现在存世的《晁氏宝文堂书目》乃是晁璫后人以晁璫所编书目初稿为基础，对家藏书籍重新加以清点，并补充了一定数量的新收书籍而最终形成的。其一，《晁氏宝文堂书目》中著录了相当一部分问世于晁氏父子身歿之后的书籍。晁璫卒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偶感寒疾，数日殂”^{[7]184}。其子东吴过世更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甲寅，封君（按：璫父）疾作，卒于家。讣闻，公哀毁骨立，而吉士君（按：东吴）即谒告同归。抵里甫半月，吉士君亦卒。”^{[3]184} 据王重民先生考证，《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的书籍中有不少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的小说，其中最晚的刘希贤刻本《三遂平妖传》问世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此时距离晁璫、东吴父子二人过世已有数十年之久，这些书籍当是由后人补录的^[8]。其二，查考《晁氏宝文堂书目》的著录体例，往往于书名之下出现“欠”“不全”“完”“不完”一类的小注，如《外戚事鉴》下为“经厂刻，欠下册”，《左传春秋直解》下为“十二欠二本”；《河洛易数》下为“不全”，《六家唐诗》下为“闽刻不全”；《皇朝类苑》下为“不完”，《通志略》下为“二部完，一部不完”等。这些字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与《赵定宇书目》等书目的现存版本中亦多有对书籍佚完缺情况所做的标识，皆为后人在清点整理过程中所做的备注。《晁氏宝文堂书目》“图志”类《皇明旧陕西志》一书下有“零册”二字，是明显的持目对书、一一清点的痕迹。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晁氏宝文堂书目》旧为黄虞稷、曹寅、程晋芳诸家收藏，未曾付梓，流传不广。国图藏明抄本三卷，称《宝文堂分类书目》，内有“大明贵池刘氏藏书”“榴城鉴藏”印鉴二枚，或为该目现今存世的唯一版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铅印本（与《徐氏红雨楼书目》合订）、《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皆据该本影印，今

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据此本重印。刘氏名城，字伯宗，明季诸生，入清屡荐不仕。《丛书集成续编》收录《刘城先生年谱》及其所著《峰桐集》。

《晁氏宝文堂书目》不按四部分类，而以御制书21种冠诸卷首（《礼制集要》至《御制》），其后分为上、中、下三卷，各卷细目及收录数量如表1。

表1

卷次	部类	数量	总计
上卷	诸经总录	36	12目2439种
	易	59	
	书	30	
	诗经	11	
	春秋	37	
	礼	71	
	四书	88	
	性理	68	
	史	291	
	子	78	
	文集	690	
	诗词	980	
中卷	类书	140	6目2067种
	子杂	1346	
	乐府	354	
	四六	18	
	经济	171	
	举业	38	
下卷	韵书	77	15目2421种
	政书	51	
	兵书	56	
	刑书	31	
	阴阳	200	
	医书	289	
	农圃	11	
	艺谱	111	
	算法	12	
	图志	468	
	年谱	54	
	姓氏	9	
	佛藏	540	
	道藏	276	
法帖	236		
3卷	33目	6927种	总计

上中下3卷总计33目，收录书籍6927种（按：其中有多种书籍收录了不同的版本并予以标识，如《玉台新咏》“一部二本，一部六本有续集”，《韵府群玉》“元刻一部，监刻一部，弘治刻一部”）。《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书名，多记版本、部册数、纸张类别、书籍全缺情况。间有题记，简

述作者、成书年代等信息。“子杂”“乐府”二目收录了大量的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在历代书目著录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该目设置“性理”类,是对《文渊阁书目》分类传统的继承;设置“四六”“举业”“年谱”等新类目以及将“乐府”类独立于“诗词”类之外等做法则是晁氏的创举。晁琛对类目所做的调整是明代目录学家于书目分类法方面的创新实践之一,为书籍分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著录特色

(一) 著录了清查书籍的情况

《晁氏宝文堂书目》中保存有晁氏后人多次清查藏书时记录的书籍存佚情况。如易类之“《河洛易数》,不全”;春秋类之“《左传春秋直解》,十二欠二本”;四书类之“《四书大全》,不全”,性理类之“《朱子语类大全》,全”;史类之“《通鉴纲目书法》,元刻,不全”等。私家藏书目中的书籍存佚情况可补史志目录之阙,为后世考订古籍散佚流变提供重要的信息凭证。

(二) 著录了重要的版本信息

晁氏父子藏书极富,其中不乏宋槧精刻者。《晁氏宝文堂书目》以精简灵活的方式保存了异常丰富的版本信息,著录重点大致有如下几类。

其一,对所藏复本皆作说明。如易类有“《易传》,内府刻一,外刻一”“《易占经纬》,五”,诗经类有“《袖珍诗经集注》,五部”,春秋类有“《春秋会传》,四”等。重视收集复本并加以著录,既是对藏书情况的如实反映,也表明了晁氏对同一书籍不同版本之间差异的认识,是其重视校勘、重视异本、藏书致用的风格体现。

其二,对“绵纸”本皆作标识。绵纸即用树木韧皮制作的纸张,色白而柔韧,纤维细长如绵,故名。该目春秋类的《春秋列传》、史类的《资治通鉴白文》、子杂类的《辍耕录》、类书类的《经籍考》、韵书类的《六书本义》等书名之下皆标注“绵纸”字样。从纸张生产的角度来说,皮纸、竹纸等各类纸张问世于不同的时期,有各自的集中出产地,如魏晋、唐初的剡溪青藤纸,唐宋之后闽赣地区的竹纸等。从纸张使用的角度来说,纸张的品类直接关系到书籍的刊印成本,不同的责任人会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纸张来刊印内容各异的书籍。由此,纸张品类成为历代文献学家重点关照的版本鉴定依据之一。明代另一位著名藏书家胡

应麟亦关注印书用纸,认为“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楮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束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束,直以价廉取胜。闽中纸短窄黛脆,刻又舛讹,品最下值最廉”^{[7]50},可知明代印书以绵纸为最上。绵纸成本与售价相对较高,能够采用高价纸刻印的书籍以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流传价值的正经、正史及相关著作作为夥。《晁氏宝文堂书目》对“绵纸”本做特别著录,正表现出晁氏对藏书价值的着重强调。

其三,著录大量的藩府本并予以标识。如易类“《王弼周易》,赵府”,史类“《通鉴博论》,宁府”“《十八史略》。宣府刻”,子类“《谭子化书》,伊府刻”,文集类“《栾城集》,蜀府刻”,类书类“《初学记》,沈府刻”等。

明代藩府刻书数量既多、价值亦高,所刻之书多有珍罕秘本。王弼单注本《周易》存世版本稀少,赵藩朱厚煜味经堂于嘉靖间刻有王弼《周易注》十卷,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赵府本《王弼周易》今惜不传,《晁氏宝文堂书目》的记载当为该书最早见载于史料者,是较为原始可靠的文献依据。《谭子化书》一种,《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影印的国图藏明抄本下字迹模糊,隐约可辨为“伊府刻”的字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排印本直称“伊府刻”。按《谭子化书》的明代藩府刻本可考者为两种。一为天顺间代府刻六卷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叶德辉《书林清话》、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等皆有著录。一即伊府刻本,《晁氏宝文堂书目》之外,仅见载于张秀民《中国印刷史》^①张氏未标出处,或亦采自晁氏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叶德辉《书林清话》对伊府刻书的记录皆仅有嘉靖戊申(1548年)《四书朱注》一种,未见《谭子化书》。由上可知,明伊藩刻本《谭子化书》当仅见于《晁氏宝文堂书目》的记载。“伊府”或为“代府”之讹。

其四,保存了大量、丰富的版本类型。有礼部刻本,如阴阳类的《选择历书》,医书类的《婴童百问》。有御马监刻本,如医书类的《马经》。有经

^①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按:陈清慧《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称伊府本《谭子化书》见载于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与晁琛《晁氏宝文堂书目》(《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第9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王国强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亦著录伊府本,称“刊刻时间不详”,未标明出处(《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第2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厂本,如《外戚事鉴》。有内府板,如诸经总义类的《尔裨雅》,易类的《易经大全》《易传》,书类的《书经大全》,史类的《宋元通鉴节要》《资治通鉴纲目》,类书类的《文献通考》等。有监板,如史类的《皇明开国功臣录》《前汉书》,诗词类的《杜工部诗》等。有巾箱本,如礼类的《周礼》。有抄本,如春秋类的《春秋繁露》,史类的《靖康要鉴》,文集类的《海陵周公集》《张文忠公集》,类书类的《诗话总龟》《北堂书抄》等。有木刻,如法帖类的《东海草书千文》《释义献六十帖》。有石刻,如法帖类的《宋名贤分写四十二章经》《姜白石续书谱》。有“旧板”“旧刻”,如书类的《书经大全》,礼类的《礼记大全》,四书类的《四书大全》,史类的《稽古录》,类书类的《辍耕录》,诗词类的《元音》等。有“新刻”,如礼类的《大戴礼记》,医书类的《救荒本草》《张仲景金匱要略》等。

《晁氏宝文堂书目》成书于嘉靖时期,隆庆、万历年间又有续添。其时新刻的《大戴礼记》最负盛名者当为嘉靖十二年(1533年)袁褫嘉趣堂的翻宋本十三卷四十篇。该本以北宋淳熙二年(1175年)韩元吉郡斋刻本《大戴礼记》为底本,左右双边,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于《大戴礼记》各家版本中最称详核。此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大戴礼记注》十三卷,北周卢辩撰。明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亦正嘉间刊本,版式高调,与袁本不同(己未)”^{[9]58}。王锸《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对《大戴礼记》的诸家版本作有详细考证,可资参考。袁褫嘉趣堂以刻书精审著名于外,常熟赵氏《脉望馆藏书目》对嘉趣堂翻宋刻的《文选》亦特别标识,称“袁家板”,可知嘉趣堂校刻诸书在明代即受到藏书家的普遍重视。明代中后期复古学风兴起,宋本书渐为学人宝贵,翻宋刻大量问世。《晁氏宝文堂书目》之外,《脉望馆藏书目》亦将宋刻、翻宋刻一一标明,是时代风气在目录学领域的体现。《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如此多的版本类型,可知晁瑛具有相当完善的版本意识。这些版本名称的产生同时也是嘉隆时期刻书日趋繁盛的直接结果。

其五,著录了部分书籍的刊刻者、刊刻地区与刊刻年代。刊刻者如史类“《小通鉴》。刘弘毅刻,欠二册”,文集类“《补注古文大全》,弘治刻,李纪板”,子杂类“《颜氏家训》,三十一世孙刻”等。刻书地区如春秋类“《音点白文左传》,徽州

刻”,四书类“《大学集注标题》,顺天刻”,性理类“《中庸辑略》,武进刻”,阴阳类“《历法通书大全》,江西刻”,子类“《崆峒子》,苏刻”“《墨子》,天泉刻”,文集类“《韩文》,苏刻二十本,闽刻五本”“《柳文》,徽刻六本,闽刻五本”等。刻书年代有元刻本,如史类的《十七史纂》《通鉴纲目书法》,类书类的《群书勾玄》等;有宋刻本,如史类的《南史详节》,诗词类的《万宝诗山》《湖山杂咏》《北山诗话》《江湖前后续集》等;有明刻本,如子杂类的《学范》(国初刻),春秋类的《左传句解》(宣德间刻),四书类的《四书句解》(成化刻)、《大学解义》(宣德刻),诗词类的《增广事职诗学大成》(洪武刻)等。

刊刻者、刊刻地区与刊刻年代不仅是鉴定书籍版本的重要线索,亦可作为考见其时各地刊书概况的史料依据。以诗词类《万宝诗山》为例,该书标注为“宋刻国朝序”。《万宝诗山》最早见于《文渊阁书目》的记载,为“《万宝诗山》一部,十三册”“《万宝诗山》一部,一册”两种。叶盛《策竹堂书目》卷四著录为十三册。正德间夏良胜《建昌府志》亦著录该书,不载卷册、版本。清代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称“宋板《万宝诗山》”。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称“《万宝诗山》三十八卷,宋巾箱本”。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称“宋刻残本”二卷。陆心源《仪顾堂续跋》称“盖理宗淳祐末年刊本”。王余光《藏书四记》称:“《万宝诗山》是明宣德四年书林叶景逵刻本,莆田余性初作之序……其所空缺,即宣德四年四字,不免为书贾所愚。而著雍作噩即当是屠维作噩,偶然笔误”,认为该书为明宣德间叶氏广勤堂刻本^①。叶德辉认可岛田翰的观点,称该书前余性初的序乃书贾挖去以欺钱谦益^{[10]116}。黄永年亦称其为宣德板,“《绛云楼书目》把明宣德时,建阳书坊叶氏广勤堂刊刻的《万宝诗山》误认为宋板”^{[11]22}。

《万宝诗山》一书,称元刊本者有之(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称“元方回编,元建阳书坊刊袖珍本”)^{[12]394},称宋刊本者亦有之(按:如钱、莫、潘、陆等人。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著录《万宝诗山序》,称余性初为“淳祐间莆田人”,当

^①王余光《藏书四记》,湖北辞书出版社,299页,1998年。按: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增订版)》称“景逵应作景达”(《图书版本学要略》第88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陆心源《皕宋楼藏书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皆称“叶景达”。“叶景达”为是。

为沿袭《仪顾堂续跋》的著录)^{[13]11}。自岛田翰而后,学界多以此书为明版。岛田翰之外,傅增湘、李盛铎等皆有目验之本,俱称明槧^{[9]394}。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有《选编省监新奇万宝诗山》一篇,认同岛田翰所称传本刊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提出该书“传本虽为明人所刊,但必源于宋代旧籍”的推论^{[12]395}。祝氏立论,依据有五。其一,因余性初序中“叶景达氏掇拾类聚,绣梓以传于世”之言,认为叶氏“掇拾”者当为前世旧本,而叶氏仅作“类聚”之功。其二,称书中所载诗歌“缺作者名,正为宋代省监试进士糊名誊录试卷之旧式”。其三,称宋末书坊刊举业书牟利蔚然成风。其四,以《文渊阁书目》著录的《万宝诗山》下称“阙”为据,称“若文渊阁所藏是广勤堂本,而该本刊于宣德四年,当时颇易得,何必皇家藏本尚‘阙’”。更疑广勤堂刊本称《选编》的原因,乃以文渊阁残阙本为底本之故。

笔者认为,祝氏断言《万宝诗山》乃明覆宋本的说法或难成立。其一,叶氏“掇拾”的对象不一定为前世旧本,更可能为散见之单篇试卷,亦可称为“类聚”。其二,自北宋以降,历代试卷誊录皆糊名,称为“弥封”。弥封官专司其职,封后送誊录所,抄为朱卷后交由考官评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取消誊录朱卷之制,考官直接评阅弥封墨卷。单凭该书所收诗歌不署作者名姓的做法,无法判断其著成于宋或明。其三,举业书在北宋末确已出现雕版印刷的批量化生产,然而这种风气于明代尚存,至嘉隆、万历时期乃至于极盛,出现了“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的情况^{[14]卷105,332}。此点同样无法作为《万宝诗山》有宋刊本的依据。其四,《文渊阁书目》中“完全”“阙”“残缺”等字样乃万历年间孙能传等人清点文渊阁藏书时补入,非为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等编目时著录。以顾修《读画斋丛书》本《文渊阁书目》为例,万历年间孙能传等人对书籍的清点著录有三种模式,一为“完全”,乃清点时全存之书;一为“残缺”,乃清点时非为完帙之书;一为“阙”,乃清点时全书已佚者。该本附有鲍廷博识语,对其校补该目时移录此类字样一事有明确说明。《文渊阁书目》著录有《万宝诗山》两部,或正说明正统间此书不难获得。叶氏刊本称《选编》者,或正因叶氏辑录的对象原为散篇残卷之故。综上,《万宝诗山》一书基本可以认定为明宣德四年(1429年)叶氏广勤堂辑刻。时

人莆阳余性初为之作序,随书付梓。

此外,祝氏认为叶盛藏本的册数与文渊阁本同为十三册,亦当抄自内阁,称“不可能当时既有刊本,叶氏尚徒费精神去抄录”^{[12]395}。叶盛勤于抄校,“做官数十年,未尝一日停止抄书”^{[15]1450}。叶抄本为明抄珍品,多用绿墨双色格纸,版心书“赐书楼”字样,甚为精致。叶盛的主要活动时期为正统年间,与杨士奇校理内阁藏书的时间相差无几。历史上,由于某种书籍的学术价值较高或传藏不便等原因,往往存在学者手录抄本与刊本并行的情况。晚于叶盛一个世纪的赵用贤即有手抄书籍的事迹。《赵定宇书目》著录有“《传心录》。一本。又抄白一本”,“抄白”者即为抄录的复本^{[16]4}。《传心录》即明人钟庚阳《尚书主意传心录》,有万历九年(1581年)刊本,六册一函。明代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隆庆、万历年间书籍的生产数量及流通程度与正统间已不可同日而语。赵用贤活动于隆庆、万历时期,在已收得《传心录》刊本的情况下尚行“抄白”之举,则早在正统间的叶盛抄录已刊之书亦大有可能。由此可知,叶盛抄录《万宝诗山》的底本或与文渊阁藏本同源,然恐难断言其直接抄自于文渊阁藏本。

明初广勤堂所刻各书多为仿宋。叶德辉称“吾藏有广勤堂刻李焘《通鉴宋元续编》残卷。字体圆活,有南宋刻本遗风”,认为广勤堂刻版精美,故而“虽牧翁、沧苇诸人,在二百年前已不能分其真贋”^{[10]117-118}。《万宝诗山》一书亦采用了仿宋刻的版式,刻工误将“屠维作噩”刻作“著雍作噩”,正为书贾使诈提供了可乘之机。此书刊行后,奸贾乃将余序中“宣德四年”的字样挖去,以充宋刻。《晁氏宝文堂书目》所称“宋刻国朝序”者,正为本文的推断提供了证据:既是宋刻之书,何来明人之序?其称“国朝序”者,自为莆阳余性初之序。其所谓“宋刻”者,当因其时序内“宣德四年”四字已被挖改,故而与钱谦益一般,误认仿宋为宋刻。《晁氏宝文堂书目》成书于嘉靖年间,又经晁氏后人增补。经王重民考证,该目所载之书中间世最晚的当属刘希贤刻本《三遂平妖传》,付梓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8]。则《万宝诗山》一书于其时或已遭挖改。

《万宝诗山》的成书年代历来是学界公案。各家争议,未有确论。《晁氏宝文堂书目》的记载,不仅为岛田翰的说法提供了证据,更为广勤堂

刻本《万宝诗山》被挖改之事提供了新的时间线索,是版本学史的重要史料。

(三) 著录了书籍的内容、结构等信息

《晁氏宝文堂书目》于著录中对某些书籍的内容结构、创作宗旨等亦略作阐释,如于子杂类《双节集》下称“张给事二妾”,于年谱类《庐陵曾氏家乘》下称“旌节崇议表忠终孝”等,为读者了解书籍的内容大概提供了参考。值得一提的是,《晁氏宝文堂书目》在著录某些小说集的时候采用了按篇著录的方式。如其“不著录《虞初志》,却基本上著录了《虞初志》所收篇目”^[17]。同时期的《百川书志》亦采用将书名与篇名并行著录的形式,或成一时风气。

(四) 大量采用了“互著”法

《晁氏宝文堂书目》中有不少前后重复著录的现象(如“子杂”类著录书籍 1346 种,其中完全重复者为 58 种 121 本)。四库馆臣称其“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检阅”^{[18]2258}。事实上,排除某些同一版本在同一类别中重复出现的情况不论,这些“复见错出者”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为异书同名,今难以考证;其二为同书不同版本者;其三为明人编目常用的一种著录方式——互著法。《晁氏宝文堂书目》在处理同书不同版本的情况时,大致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著录一次书名,在其下标注各个版本,如类书类有《居家必用》一书,下有备注“内府刻十本,闽刻六本,蜀刻一部”。另一种是随书就录,这也是账簿式书目的一大特色。如史类著录了四处《十八史略》,一处为“宣府刻”,一处为“白文”,一处为“宣德刻”,一处为“永乐刻”。互著法在目录学中的运用首见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其后《澹生堂藏书目》《百川书志》等皆有运用^①。《晁氏宝文堂书目》在著录时亦大量采用了“互著法”,如算法类《康节前定》《革象新书》下皆有“见阴阳”的字样。佛藏类《庐山东林寺志》下有“见图志”三字。又《诗话总龟》在诗词类跟类书类中皆有著录,《韵府群玉》见于类书与韵书两类,《楚史棹机》既见于史类又见于子杂类等。这些书籍在内容上往往不明确属于某一类,经常兼有两类或以上的属性,作者在登记时采用互著的方法,可以保证条目归类的精确性,也能凸显出书籍的自身特性。

四、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作为一部直观的账簿式登录书目,《晁氏宝

文堂书目》虽无解题,但却以简略著录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版本信息,是后世研究明代版本源流的重要史料。以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一书为例,该书目前存世有元刊本、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刘弘毅慎独斋刊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陕西布政使刊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崇新书局石印本等,而宋刻本唯独南图存有一部,称《明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已是绝世珍宝。《晁氏宝文堂书目》史部著录有宋刻吕祖谦《南史详节》,当为该书宋刻本在明代存世的证明。书目中著录的宣德刻《十八史略》一种,应是明宣德间刘刻刻本。宣德年间,江西民间学者王逢重视《十八史略》,在其书页天头加写内容提示性的标题,以便于教学使用。弟子刘刻取明初陈殷的音释与王逢的点校、标题合编一起,成为新的本子。《晁氏宝文堂书目》不仅著录了其时已有的、大量的版本类型,而且对刻版时间、刻版地点、刻版人乃至刻书的用纸情况等皆作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凸显了晁璪较强的版本意识。

《晁氏宝文堂书目》中乐府类的设置为晁璪首创。姚名达称其“分乐府于诗词之外,并古录所未曾及者”^{[19]8}。该类著录元明话本、小说、传奇、杂剧等 354 种。“除去诗词、乐律以及杂类,著录有 290 余种;而且曲学文献著录的小类也逐渐丰富,除杂剧、戏文外,还有散曲、诸宫调、曲谱、传奇等内容的著录”^{[20]21}。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话本和古剧》等著作中,都大量征引了《宝文堂书目》中对小说戏曲的记载^{[21]254}。

《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的话本、小说、杂剧、传奇、医书等文献不仅数量可观,且多有仅见于该目记载者。赵万里《跋晁氏宝文堂书目》称该目的“子杂、乐府二门,所收之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至多,为明代书目所仅见,至可贵也”^{[22]241}。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说明》称:“晁氏收藏宏富,颇有在其他著录中不见或罕见的书名,如子杂门著录《东轩笔录续录》,《续录》除见于宋史艺文志而外,别处几未见过;乐府类著录《稼轩余兴》,恐怕是辛弃疾词的别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几乎仅见于本目的著录;医书类著录《东坡集药方》,可能

^①按:章学诚《校雠通义》称互著法肇始于《七略》,而班固、郑樵之后,世人乃不知有互著、别裁之法。

是《苏沈二内翰良方》苏轼医方部分的蓝本,沈括医方部分的蓝本是很清楚的,苏轼的却一直没有搞明白,这材料就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23]《晁氏宝文堂书目》的记载,为后世研究元明文献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 [1] 焦竑. 国朝献征录[M]. 台北: 学生书局, 1984.
- [2] 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 [3] 王义印. 濮阳碑刻墓志[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 [4] 张剑, 王义印. 《宝文堂书目》作者晁琛、晁东吴行年考[J]. 文史, 2007(3).
- [5] 刘焕阳. 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 [6] 王绍曾, 沙嘉孙. 山东藏书家史略(增订本)[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 [7] 胡应麟. 经籍会通(外四种)[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 [8] 王重民, 等. 中国目录学史料(十)[J]. 图书馆学研究, 1982(5).
- [9] 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0]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2.

- [11] 黄永年. 古籍整理概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12] 祝尚书. 宋人总集叙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3]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346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14] 李濂. 纸说[M]//黄宗羲. 明文海: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南炳文, 汤纲. 明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16] 赵用贤. 赵定宇书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7] 向志柱. 《宝文堂书目》著录与古代小说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 [18] 永瑢,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9]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0] 刘唯唯. 明清综合性书目中曲学文献的著录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 [21] 王国强. 明代目录学研究[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 [22] 赵万里. 跋晁氏宝文堂书目[M]//晁氏宝文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3] 古典文学出版社. 晁氏宝文堂书目·出版说明[M]//晁氏宝文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New Comment on the Literature Value of *Bao Wentang's Catalogue*

SUN 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Bao Wentang's Catalogue* is a representative personal book catalogue of the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family's books, it consists of three volumes, amounting to thirty-three categories. Some new categories such as "siliu", "juye", "yuefu" are set up, the books' checking condition of later ages, their inscribing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structure are recorded, abundant popular literature books such as scripts for story-telling, novels, zaju, and tales of marvels are included. Rich version information is especially preserved. In addition, a new scientific "mutual record" method is adopted for the convenience of retrieval and consultation.

Key words: *Bao Wentang's Catalogue*; category; record; version; value

(责任编辑 陇 右)